

• 专题：技术中的观念与价值 •

编者按：

技术哲学与时代紧密相关，当今关于技术的哲思呈现出观点纷争、百花齐放的态势。它是人类发展的缩影，记录着每一个世代人类与世界的相处方式。人类观念与价值往往是借助技术人工物表达的，它反映着人与技术复杂、交织的存在论境况。技术是人的在世方式，关于它，从来都不缺少有理、有趣、有益的哲思。

本期专题收集了4篇技术哲学论文。王兴业“由恶紫到贵紫的用色之道——基于技术视角的考察”从技术史角度阐释了超越颜色本身的技术价值蕴含，逐步论证“贵紫”造价高昂的经济逻辑、罕见则贵的宗教逻辑、服定尊卑的统治逻辑、工艺稀缺的技术逻辑。臧敏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新’批判与药理学启示”讨论了斯蒂格勒以电影为媒介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思电影工业的意识操控与个性化丧失导致的“存在之痛”，尝试在药理学启发下沉思技术本质。李洋“技术范式的流变：从效果-效率原则到价值嵌入”讨论了技术范式的价值转向问题，通过梳理技术价值范式的历史渊源、理论逻辑和实践意义，分析论证了“功能-效率-价值”融合的新技术范式。徐秋石、田松“摄像头的开启与在场情境的建构——在线教学的技术社会学实践”从社会建构论视角讨论了社会群体驯化技术和被技术驯化的实验案例，运用场景构建的方法反思了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的人与技术的互构关系。

(专题策划：李洋)

由恶紫到贵紫的用色之道 ——基于技术视角的考察

The Technical Log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lor Selection:
From Aversion of Purple to Appreciation of Purple

王兴业 / WANG Xingye

(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4)
(School of Art Design,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104)

摘要：从正色为尊观念影响下的“恶紫”，发展到后世的“贵紫”，这是礼制色彩制度中非同寻常的文化现象。以技术为视角展开对紫色地位变迁的考察，认为紫色地位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紫色的染料难得，染制工艺繁复，这种稀缺性让它借助政治礼制和宗教因素的推动，一跃成为贵色，并长期为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神圣与世俗的共构：民间造物色彩观念研究”（项目编号：20FYSB046）；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优秀青年项目“基于设计学视角的传统民间造物色彩研究”（项目编号：19B134）。

收稿日期：2023年2月14日；**返修日期：**2024年11月11日

作者简介：王兴业（1982-）男，山东青州人，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工艺与设计创新、传统色彩。Email: 378107900@qq.com

层阶级所独享，而使用上的独享又进一步强化了它的至上地位。紫色地位的变迁展现出中华传统用色的独特逻辑。

关键词：恶紫 贵紫 技术视角 以色显礼

Abstract: The color of pur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pure color is the respect of color”, is developed from “aversion of purple” to “appreciation of purple”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is an extraordinary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ritual color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hange of purple status is largely due to the rare purple dye and the complicated dyeing process. This scarcity makes it become a precious color with the help of political etiquette and religious factors, which has been exclusive for the upper clas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exclusive use further strengthens its supremacy. The change of purple status shows the unique logic of traditional color.

Key Words: Aversion of purple; Appreciation of purple; Technical perspective; Color showing etiquette

中图分类号: N09; J502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03.001 CSTR: 32281.14.jdn.2025.03.001

引言

作为颜色个体，紫色地位的变迁耐人寻味。紫非五行正色，从被贬抑到流行，再到被崇尚，作为间色的紫甚至超越正色的地位，这在2000多年来的中华色彩文化史中是不多见的。对贱紫到贵紫的文化现象，已有学者予以关注，如日本学者杉本正年认为这话转变是由于中国南北朝时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导致了汉民族自身色彩观念的渐次变化。^[1]曾磊则认为紫色逐渐拥有高贵之地位，与星宿崇拜及宗教密切相关。^[2]也有学者则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紫色由卑贱到高贵的文化现象。^[3]但从恶紫到贵紫却还包含有技术上的逻辑。

一、从“恶紫夺朱”说起

通过对紫色使用观念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先秦时期，作为“间色”的紫就被置于卑下之位。《论语·阳货》有载：“恶紫之夺朱也”，孔子对紫色毫不掩饰地持嫌恶态度，皆因紫非正色，夺朱是以间犯正，有违礼制伦理。（[4]，p.214）在推崇礼制的孔子看来，色彩有尊卑，服饰的颜色自然要符合身份、场所和具体的功能，丝毫不能混用，否则便是非礼逾制，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不循礼的人，其人品、德行，乃至为政的举措都是要被怀疑的，这种

重“礼”崇“度”的儒家色彩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色彩的使用被纳入礼制化和伦理化的规范之中，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紫色的看法。在礼制色彩观的影响下，色彩的运用要合礼适度，尊礼为要，以礼节情，决不可随意。《论语·乡党》载“君子不以绀緌饰，红紫不以为褻服。”（[4]，p.113）绀（泛红的青黑色）緌（青赤色）作为祭祀时穿着的礼服的颜色，是不能随便使用在饰物上的；同理，不是正色的红紫，近于妇人的服色，也不宜做私服的色彩。

然而，春秋时期却大开好紫之风。《礼记·玉藻》载“玄冠紫綬，自鲁桓公始也。”“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5]，p.422）作为诸侯王，鲁桓公戴紫色冠带、齐桓公身着紫服显然都是不合礼制的，因为紫非正色。另一方面，桓公已经意识到，人人效仿他服紫是个严重的问题。紫色价高，制取与染制不易，长此以往，必然耗损国力。而由于可以获取暴利，“齐人紫，败素也，而价十倍”，有人把劣质的素帛染成紫帛，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利十倍，引发市场秩序的混乱。^[6]最终，桓公不得不从自身做起，“欲民无衣紫者，王请自解紫衣而朝。”（[5]，p.422）

文献记载了桓公好服紫的历史事实，但对其中缘由却语焉未详。早已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桓公服紫绝非刻意去违背正色为尊

的礼制规范，而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用衣紫来标榜身份。阎步克先生认为“中国的皇帝不是神而是人，甚至不是儒家期许的圣人而是凡人，他也渴望着士人和民间的乐趣，他的荣华是世俗化的荣华。……跟进舆服时尚，把散漫无章的时尚等级化，吸收新事物为旧制度服务也是中国舆服制度的规律性现象。”^[7]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服饰的多元随意也罢，服色的标新立异也好，都还是要讲规矩的。“鲁哀公之时，紫衣为君王所服，已成制度，他人不得僭越。”^[8]《左传·哀公十七年》载：“良夫乘衷甸两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历史上记载的这个身着紫色的鲁国大夫，后来被鲁国太子所杀，太子给他三条大不敬之罪：紫衣、袒裘、带剑。^[9]因紫衣而获罪，恰恰证明了紫色在当时的专享性，并非人人可用。

我们认为，紫色能够成为高贵身份象征皆因一点，即价格高昂。当时以何种染料染紫，据推测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植物——紫草，另一种来自动物——紫贝。具体为哪一种，因无实物遗存，我们只有根据文献推测。《荀子·王制》载“东海则有紫、紘、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10]史学家夏鼐先生认为紫紘即是石蚶，推测其重要产地在齐国所处的今山东省境内。《江淹·石蚶赋序》载：“海人有食石蚶，一名紫蚶，蚌蛤类也。”^[11]《康熙字典》中对石蚶的解释为：“石蚶状如蟹螯，其色紫。”^[12]食用药用之外，推测其极有可能被用作染色之用，认为当时的齐国人已经掌握了贝紫染色的技艺，而贝紫染色所具有的特殊气味也恰好验证桓公“吾甚恶紫之臭”之说。（[5]，p.422）近年来，有学者用山东沿海的脉红螺成功做过染色实验，而由脉红螺腺体发酵制成的染色物质带有特殊的臭味，似乎也印证了文献中“吾甚恶紫之臭”的记载。不过，对于齐桓公时流行的紫衣是否由骨螺紫染制而成，至今仍无确切可信的证据。^[13]贝紫染色极为费时费力，为防止天下好紫，引发国家资源耗费，深以为患的桓公才去求教管仲，寻求禁紫之法，结果是借助桓公“甚恶紫之臭”的方法实现了对大规模服紫的禁除。但其后我国古代染色技

艺中，染紫的原料多源于紫草、苏木一类的植物，贝类染紫逐渐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几乎再无记载，是否是由于这次桓公恶紫而步入发展的低潮，乃至湮灭，仍有待研究考证。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紫染原料非骨螺。因为紫草根染出的织物也带有较浓的臭味，且“一国尽服紫”这种形成大范围流行的紫色染色量，骨螺难以达到，但紫草却可以实现。春秋战国时期，紫草染色技艺已然成熟，且齐地也是紫草种植的重要产地。^[14]同时，也应指出，染色用的紫草有多种，其中软紫草确实具有特异的气味，这种紫草生长在新疆、西藏等高海拔地区。而种植更为广泛的大紫草（硬紫草），却无特异的气味，但限于目前国内尚未发现确凿可信的骨螺紫遗物，对这一问题的争议还将持续。

事实上，面对天下好紫的情况，齐桓公之所以求助管仲，并非完全出于上下失序的担忧，而是因为担心国家财富的耗损。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染紫工艺费工价高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也无需引发国家层面的担忧与禁止。

二、道释崇紫观念的推波助澜

除了前文所分析的技术因素之外，崇紫重紫的风尚也与占星术以及道教思想紧密关联。紫色在阴阳五行说流行和道教兴盛之后，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尤其在崇信道家思想的两汉时期，紫色借助星宿崇拜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地位进一步上升。“在秦汉人眼中，紫色高贵与神秘的意涵逐步加强，低贱的含义则逐步退却。”^[15]古代天文学家将全天分为三垣，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紫微垣，人们认为紫微垣位于天的最高处，居星空中枢，被认为是天帝所居的宫殿，称为紫宫，为皇极之居。紫微星（北极星）也称帝星，古人认为它位于天之最高点且居中不移，地位至高无上。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天地类》中对紫微垣的解释显然是基于五行思想的逻辑，认为“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水火相交，万物以之为生；万物以之为生，是为万物之主宰，故垣具天枢星、天皇帝星。所以天子之居，

亦谓之紫宸。”^[16]由此，祭天祀神的场所也常用紫色，“祭天居紫坛幄帷。”^[17]紫色建立起与道教的不解之缘，唯紫为尊。李约瑟指出：“整个中古时期，紫色一直是道教中最具代表性的颜色之一。它像破晓及日落时天空的云霞一样具有神秘色彩，是上苍玄虚的象征……（紫色）是一种属于道教真人或炼丹术方面的颜色。”^[18]炼丹房称作紫房，神仙居所为紫庭、紫台，地位高的道士身着紫衣，记录道教真诀的仙书为紫书，圣人之气、祥瑞之气为紫气，还有诸如紫云、紫霄、紫霞、紫海云云，不断强化了紫色的神秘玄妙与至上感，使得紫色具有了祥瑞、超然的气质，成为祥瑞的象征色。这种宗教因素对紫色的推崇甚至影响到世俗政权。如崇信佛道的南朝宋明帝刘彧，标榜创新，创五冕服制，一改“玄衣纁裳”的旧制，“设大冕、法冕、饰冕、绣冕、纁冕五冕，各自适用于不同场合，本于《周礼》又大异其趣：冕名及用途有异，衣裳杂用玄、黄、绛、紫、红、朱、青诸色，‘正色’与‘间色’并用。宋明帝既说‘象数是遵’，则其服色安排应有某种神秘考虑。”^[19]其中的饰冕，以“紫衣红裳”代替了《周礼》冕服制度中的“玄衣纁裳”，其适用的场所是小会宴飨、钱送诸侯、临轩会王公。这里的用紫崇紫不得不说有宗教因素影响的因素，显然也是一种“改革创制”的政治标榜。

后续的历史发展中，连皇帝的居住之地也被称作为紫禁城、紫宸殿，祭天之所称作紫坛，所用车驾称作紫盖，皇帝诏书以紫泥封口，朝廷中枢为紫枢，宰相府邸称作紫阁，……借助宗教的神秘之力，紫色逐渐成为与黄色、赤色并列，地位崇高的颜色之一。唐宋以降，统治阶层也常以赐紫为手段，笼络僧道，并逐渐制度化。上行下效，对紫色的推重也影响到民间，如在民间房屋建造中，常在立柱、横梁上张贴“上梁正逢荒岛日，立柱巧遇紫微星。”借助色彩的联想，紫气成为祥瑞的象征，人们崇敬和使用它以趋利祈福。

事实上，紫色之所以在宗教层面被推崇，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基于紫的罕见，紫极、紫气、紫芝、紫云、紫晖、紫金丹，若稀松寻常，

是断然不会为宗教（道家、释家）所用、所重的。祥瑞难得，罕见则贵，这是紫色宗教功能的基本逻辑。

三、贵紫——以礼制为名的推重与独享

色彩在传统社会中绝不是单纯的视觉形象，而是礼制的象征物，具有明等阶、辨贵贱，维护伦理纲常的社会价值。

因其制备难度大，以及与五行思想的关系，有自秦代始，紫色便被作为高等级官员的官服颜色，后世紫色也受到众多朝代的推重，甚至成为帝王之服色，并多被列入百姓禁色之属。如汉武帝时，紫色甚至成为御服色，而当时重臣官印的绶带也是紫色的，所谓“金印紫绶”即来源于此。^[20]唐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当时佛教高僧法衣也以紫色袈裟为最高等级。《新唐书》记载：“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色，五品服浅绯。”^[21]官阶不足三品，则可通过得到皇帝的特许穿着紫衣，称作“借紫”。借紫又称赐紫，是因紫色在品级服色中的高贵地位，在唐宋时形成的一种官服制度，对无相应官阶的人赐予公服中最高等级的紫色公服，表示对有功之士的嘉赏。起初，赐紫只用作嘉奖政绩突出的功臣，唐时开始蔓延至宗教界的佛、道两教。唐之后的五代、宋均延续了对佛道的赐紫制度。这一制度成为统治者笼络各阶层的重要手段。^[14]《旧唐书·舆服志》中载：“五品以上，通着紫袍。”^[22]宋代承袭唐制，官员服色以三品以上用紫，五品以上用朱、七品以上用绿，九品以上青色。三品以上服紫，成为唐宋时期品官服色的显著特征。后世多以“佩紫怀黄”“金印紫绶”“紫袍玉带”代指身居高位。《论语·阳货》中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记载。恶紫的原因，是恐其乱朱，着非正色的紫衣，在孔子看来是有违礼制的不敬行为。明为朱姓王朝，忌讳夺朱之说。（[4]，p.214）朱元璋将朱定为最高等级的颜色，紫色地位才相对下降，但仍为官服。清代，只有皇帝的近亲及有功劳之臣的坐骑才允许用紫色纁

绳，称“赏用紫纆”。皇帝诰书以紫泥封口，称“紫诰”，以紫名物，言其高贵。可见，紫色的超凡地位已成定势。

传统服饰（尤其是礼服）的用色具有典型的依礼择色的特征。杜甫在《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中言说：“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服色是封建社会辨明尊卑的鲜明符号，以色明礼，助化人伦，维护统治。显而易见，阴阳五行理论影响下的择色用色以正色和纯色为贵，这也直接影响到礼制色彩观的基本框架。但礼制色彩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五行五色的框架之外，部分正色地位下降，如蓝色，部分间色、杂色、闲色地位上升，其中最为典型的颜色便是紫色。从前文分析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官方都以用紫服紫用紫示高贵。这里，作为间色的紫已然超越作为正色的朱赤，紫色逐渐成为高官显贵的代指，可见紫色地位之煊赫。

紫色鲜明，诚可夺朱。紫色建立起与皇权、高官、显爵的关联，也借助皇权、政治完成由“不正之色”到“高贵之色”的身份转换。那么，为何在众多色彩中选择“间色”的紫，而非它色。显而易见，紫色难得，惟有稀贵神秘方显地位的尊崇，紫色备受重视，甚至成为皇家专属色，都与其技术上的因素密不可分。

四、紫贵与贵紫 ——基于技术逻辑的考察

颜色获取的难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色彩的等级。在古代社会，较难获取的、数量稀少的颜色通常会被认为是较高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如紫色、绯色（大红色）等，因为对此类颜色的提取与施用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非常人可以负担得起。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5]，p.422）这里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当时五匹素绢不敌一件紫衣的价格，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紫色染料获取及染色工艺复杂，生产效率低

下。前已述及，据推测当时多以贝紫染色，因其色料提取的难度高，极大地推高了紫色衣物的生产成本。从活的海螺的鳃下腺的分泌粘液中提取用以染紫的染料，这一过程，必须要在骨螺还活着的时候，对其腺体进行刺激，使其分泌黏液，用于染紫。涉及两种工艺：一种是杀死骨螺，剖出其鳃下腺进行光照染色；另一种则是挤捏刺激其腺体，使之分泌物染色。因无传世或出土实物佐证，对于齐桓公身着的紫衣是否由骨螺染制，至今仍无定论。但螺紫染料的提取极为繁琐，成本极高已是公认的事实。1908年，奥地利化学家保罗·弗里德伦德尔（Paul Friedlander）利用12000只染料骨螺提取出1.4克纯净的推罗（ $C_{16}H_8Br_2N_2O_2$ ），一种含溴的化合物。紫色的染制成本，直接限定和影响了紫色的使用范围。后世，染紫多用紫草根和苏木。紫草根中的乙酰紫草根醌及紫草醌可用以染紫，但这种萘醌类天然色素用水较难萃取，受热又容易分解，且制作过程繁复，对所用染材也要求很高。染制过程中须以温水浸泡萃取色素，所染织物需经明矾水（作为媒染剂）浸泡，在40–60℃的温水中反复染制，若温度过高，也会影响紫草色料的染色效果。当温度提高到75℃以上时，紫草根染料因热稳定性差而开始部分分解，所染丝织物明显有黑斑产生。^[23]紫草虽然是分布广泛的植物，但在染色过程中需要经过非常繁复、持久的工艺处理，才能得到华丽、纯正、深浓的紫色。苏木染紫相对简易，成本降低，但其大规模流行是在宋代之后了。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复许庶人服紫。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24]时俗所好，紫色流行中隐含着—个基本前提，即生产成本的大幅降低，紫服才具备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可能。单从技术角度来看，既然成本已大降，标榜身份的意义也随之消失，也再无禁紫的必要了。

另一方面，染紫多适合丝、毛等色彩吸附力较好的质料，主要是因为丝毛系蛋白质纤维，蛋白质纤维对植物色素的亲合性更强，呈色鲜明，而丝毛等质料的表面肌理也让所染之紫色具有光泽。棉麻葛等纤维素纤维，染紫则着色

不佳,呈色暗淡。丝毛一类织造物的价格显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这本是单纯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但在深受礼制影响的中国色彩文化系统之中,染色材料的贵贱、呈色鲜灰、染色工序的简繁,都成为影响色彩等级的重要因素。这也让饱和度高的纯色、染制技术难度大的颜色成为“贵色”,而饱和度低的颜色则显质朴,成为“贱色”。这种技术因素带来的限制深刻影响到古代中国的色彩等级制度,对此,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说“盖染色初起,非人人所能为,故为侈靡之事,惟王公贵人用之,后遂沿以分别等级也。”^[25]实为卓见。紫色恰恰占据了染料、染材、工艺等若干环节的最顶端,这也成为它超然地位的重要支撑。

无独有偶,紫色在欧洲的地位也是非同寻常。以研究色料闻名于世的英国科学与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所言:“在人类的整个‘颜色发明’史上,紫色色彩都很难制备;西方直到19世纪才有了好用、稳定的紫色色料。”([26], p.序)古代欧洲的贝紫染色自于产自地中海地区一种叫做骨螺的贝类,其染色工艺的难度在于原料染液的提取的不易。公元1世纪,古罗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博物志》一书中记载了贝紫的采集过程,“染色海贝的生长期大约在一年左右,春夏季节是采集的时间,因为那个季节会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提取的分泌物要加以处理,方法是将贝内的肌肉和内脏取出,加盐淹泡三天,然后用蒸气加热法,剥落鳃下腺内的分泌物。”^[27]所用的染紫的原料就来自这个鳃下腺的分泌物,“每个贝类只产生一滴染料,这就是此物如此极度珍贵,腓尼基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身于制取它的原因。一盎司的染料需要牺牲掉约25万只贝类动物。至今,腓尼基人的壳堆仍然杂乱地分布于地中海的东岸。”([26], p.239)对骨螺用以染色的鳃下腺的提取,须确保在骨螺死亡之前,完成对其腺体的刺激,紫色物质才会被分泌出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腺体的提取过程,需要在阴暗处完成。这是因为,腺体分泌物一旦遇到光和氧气,便极易氧化。而氧化的过程,也就是紫色发色的过程。完成这

一过程耗时极其短暂,二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氧化完全。假如整个氧化过程,在染色之前就已经全部完成了的话,那么,紫色物质就无法再附着于面料上了。”^[28]大规模、高纯度紫色的获取难度可想而知了。

显然,欧洲对紫色的推重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原因的。与欧洲皇室贵族的关联,强化了紫色的超凡地位。“在共和时期的罗马,这种壮丽的颜色严格地保留给身居高位者。紫色和金色的长袍只能由胜利的将军穿着,而正在作战的将军有权穿纯紫色的长袍。元老院议员、执政官和裁判官的托加袍边缘允许有紫色的宽条,骑士和其他同级别的人穿着窄条。在帝制时代的罗马,限制更为严格:在公元四世纪时,只有皇帝本人能穿‘真正的紫色’,并且任何拥有这种‘皇家’染料(甚至是廉价的仿制品)染色的布匹的人都会受到重罚。”([26], p.423)骨螺紫只能由皇家染厂组织生产,私自生产甚至会被处死。不论东西方,因技术、成本因素所带来的稀缺性,让紫色成为上层竞相追逐的对象。作为地位和财富最直观的显现方式,紫贵和贵紫的背后是尊卑有序的政治逻辑,“统治集团对色彩数量和质量占有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上的占有,对寓意美好的色彩符号的垄断则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优先选择权。正是这种财富和文化上的双重垄断,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29]显然,紫色作为一种色彩符号,标识的是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等级,用色以显礼,贵紫彰显的正是用色与等级的相匹配,强化的是色彩的等级制度。

结 语

禁忌、僭越与流行构成了紫色地位变迁的多样形态。工艺难度和经济成本显然是紫成为贵色的重要原因。贵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紫贵。技术直接影响成本,成本又决定使用者的层阶,并在政治强力的推动下,服紫成为一种独享,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物,并完成色彩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社会价值建构的核心职

能。在这一点上，紫色与众多传统色一样，有着极为明确的政治、伦理与文化目的性。

贵紫的意义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得以不断强化，“紫色在中国儒家文化、道教文化、释家文化的综合影响下，从边缘到中心，从被抑制到被彰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经历，这是我国多重文化交融发展而导致的。”^[30]

礼制色彩制度下并非单崇正色，紫色地位的变迁彰显的是中国文化语境中政治的影响超越五行的逻辑。而贵紫的最大动力来自其稀缺性，稀缺的缘由则是基于技术层面的。这种稀有性，以及紫色本身的华丽与神秘之感，加之五行理论与宗教因素的推波助澜，让它深受上层阶级所推重和独享。

概言之，中国传统色彩的应用与象征体系是社会思想塑造的结果，是文化与价值观的选择，而非物质与经济的结果。但技术因素和经济成本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色彩的地位。色彩择用，礼制有之，技术与成本的因素亦有之，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到礼制色彩制度，这构成中国传统用色之道的独特逻辑。

[参考文献]

- [1] 杉本正年. 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J]. 樊一译, 成都大学学报, 1995, (4): 24-25.
- [2] 曾磊. 秦汉紫色观念的演进[J]. 史学月刊, 2013, (2): 121-125.
- [3] 谢飞. “紫”字及其文化地位的演变[J]. 学理论, 2011, (11): 214-215.
- [4] 论语·大学·中庸[M].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5] 韩非子[M]. 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6] 战国策[M]. 缪文远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944.
- [7] 阎步克. 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43(2): 92-103.
- [8] 春秋左传注[M]. 杨伯峻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905-1906.
- [9] 肖世孟. 中国色彩史十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29.
- [10] 荀子[M]. 方勇、李波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25.
- [11] 江淹. 江文通集汇注[M]. 胡之骥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2.
- [12] 康熙字典[M]. 汉语大辞典编纂处整理,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1058.
- [13] 果壳网《物种日历》官方网易号[EB/O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DCJ2PND505259Q0E.html>, 2018-03-11.
- [14] 王艺璇. 紫色系中国传统服用色文化、染色及应用研究[D].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 2017.
- [15] 曾磊. 秦汉紫色观念的演进[J]. 史学月刊, 2013, (2): 121-125.
- [16] 郎瑛. 七修类稿·卷一 天地类[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6.
- [17] 范曄.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161.
- [18]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第5卷第2分册, 鲁桂珍、周曾雄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61.
- [19] 阎步克. 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 95-108.
- [20] 二十四史全译·汉书[M]. 许嘉璐译注,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312.
- [21] 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M]. 第一册, 许嘉璐、安平秋、黄永年译注,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430.
- [22] 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M]. 第二册, 许嘉璐、安平秋、黄永年译注,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1529.
- [23] 周秋宝、余志成、陈莹. 紫草染料对真丝织物染色性能的研究[J]. 丝绸, 2002, (5): 22-24.
- [24] 宋会要辑稿[M]. 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229.
- [25] 吕思勉. 中国制度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145.
- [26] 菲利普·鲍尔. 明亮的泥土: 颜色发明史[M]. 何本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27] 郑巨欣、陆越. 古代贝紫染色工艺的历史[J]. 装饰, 2011, (4): 54-57.
- [28] 戴茹奕. 骨螺紫研究[D].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 2016.
- [29] 许哲娜. 中国古代等级服色符号的内涵与功能[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6): 93-101.
- [30] 张康夫. 色彩文化学[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06.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